

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共党史研究室 编

探索·求知·开拓

TANSUO QIUZHI KAITUO

——湖北省中共党史学科2012年会论文集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013061385

D23-53

17

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共党史研究

探索·求知·开拓

——湖北省中共党史学科2012年会论文集



北航

C1667136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D23-53
17

013061382

湖北省中共党史学会 湖北省中共党史学会 湖北省中共党史学会

新出图证(鄂)字 1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探索·求知·开拓——湖北省中共党史学科 2012 年会论文集/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共党史研究室编.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 5

ISBN 978-7-5622-6003-5

I. ①探… II. ①华… III. ①中国共产党—党史—学术会议—文集 IV. ①D2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57954 号

探索·求知·开拓

——湖北省中共党史学科 2012 年会论文集

©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共党史研究室 编

编辑室:第二编辑室

电话:027-67867362

责任编辑:谢 琴

责任校对:易 雯

封面设计:甘 英

出版发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湖北省武汉市珞喻路 152 号

电话:027-67863426/3280(发行部) 027-67861321(邮购)

传真:027-67863291

网址:<http://www.ccnpublish.com>

电子邮箱:hscbs@public.wh.hb.cn

印刷:华中科技大学印刷厂

督印:章光琼

字数:320 千字

开本:710mm×1000mm 1/16

印张:18.75

版次:2013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38.00 元

欢迎上网查询、购书

敬告读者:欢迎举报盗版,请打举报电话 027-67861321

前 言

2003年,武汉大学举办了湖北省中共党史学科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学术研讨会。会上,丁俊萍教授提出了一个很好的建议,她说,湖北是党史资源丰富的省份,中共党史学科点多,从事中共党史研究的队伍大,在此学习的研究生也多,我们是否考虑每年召开一次会议,一来,导师们可以交流培养经验,研究生也可以利用此机会交流学习和研究心得,这对湖北中共党史学科建设和培养党史研究人才都有好处。丁教授的这个提议立即获得各学科点的赞同,于是,此后每年由各学科点举办一次年会,导师和研究生欢聚一堂,交流培养经验和研究心得,年会俨然是湖北中共党史界的一个节日。

2012年的会议由华中师范大学举办,算起来,也是湖北省中共党史学科第十届年会了。为了办好这次会议,我们在年初就向各学科点发送了会议征文通知。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武汉理工大学、湖北大学、三峡大学、中共湖北省委党校、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等中共党史学科点的导师和研究生积极撰文。会议于11月17日成功举行。会后,我们从参会论文中选取了部分文章,编成了这本集子,公开出版。

同以往历届年会一样,本届年会得到了中共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和湖北省中共党史学会的大力支持。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发展委员会办公室承担了会议经费,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院提供了论文集的出版经费,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亦鼎力相助。在此一一致谢。

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共党史研究室

2012年11月30日于桂子山

目 录

社会主义道路探索

1956—1966年: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与社会的历史经验	王 智(3)
全面建设时期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党的纯洁性问题的思考	吴国斌(9)
中共八大路线中断的历程考察	付 屹(15)
“156项工程”及其对新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影响初探	石文杰(22)
工业立国的地方逻辑:新中国成立初期武汉工业建设述论	许晓斌(28)
汉阳事件的原因和教训	毛传清 胡丹丹(37)
“大跃进”与“天下第一田”	毛传清 张漓儿(43)
对社会主义全面建设时期中共动员性政治参与模式的认识	张 晨(49)
湖北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经验与教训	柳作林(55)
毛泽东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动力论探析	刘明辉(62)
从毛泽东社会主义观的角度谈其统筹兼顾思想	王 瑾(68)
邓子恢和农业合作化中的几个问题	陈 驰(74)
邓小平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思想述论	杨春满 姚 军(80)
农村基层干部积极推动农业合作化原因再分析	阳卫明(86)
1949—1978年:新中国工业化之生活记忆初论	牛媛媛(92)
十年探索时期党的文化建设	吴 宇(98)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读后感

多元视角读党史

——基于阅读《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思考	杨 攀(107)
--------------------------	----------



对华国锋评价的若干思考

- 学习《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有感 王 丹(113)

全面认识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艰辛历程

- 读《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有感 赖龙波(119)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发表的历史背景新探

- 学习《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有感 罗重一 刘成婧(124)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读后感

- 以《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为比较对象的考察 朱小龙(130)

对“文化大革命”期间政治体制的反思

- 学习《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有感 冯 晔(136)

在历史中的迅进与徘徊

- 读《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有感 夏克强(142)

关于“七千人大会”评价的思考

- 读《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有感 杨 俊 俞丽君(148)

浅析五大党章中有关民主集中制的思想

- 学习《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有感 王 丹 黄从璟(153)

红色文化

试论荆楚红色文化的当代价值

- 一种基于“两型社会”视域的思考 吴 恒(161)

科学开发湖北红色文化遗产

吴筱筠(167)

弘扬“红安精神”的价值思考

李 萍(172)

重温革命精神,弘扬红色文化

- 以南下干部精神为研究中心 彭 川(178)

其 他

中共党史研究视野下的辛亥革命

- 以六部党史著作作为文本分析 袁 红(185)



早期中共政治自主意识的觉醒:中共一大到三大政治口号演变研究	
.....	吴志娟(191)
建党时期李达对马克思主义传播与中国共产党创建的贡献研究述评	
.....	吕惠东(197)
马克思主义党内监督思想探析	杜哲焱 李敏昌(204)
十六大以来我党关于文化体制改革的目标取向	刘 慧 阎 颖(210)
毛泽东青年再造思想研究(1956—1966 年)	代红凯(216)
新中国成立后刘少奇社会建设思想及其理论价值	闫振伟(221)
试论中共七大在治党能力建设上的历史贡献	蔡明周(227)
党内话语权的归属转换:1927—1945 年	
——以毛泽东在党内领导地位的确立过程为中心考察	李 岩(234)
从周恩来、李维汉的统一战线思想看中共对民主党派的政策:	
1956—1962 年	王乃婧(239)
1956—1966 年邓小平的党建思想	王本敬(245)
矫枉过正:从反对教条主义到反对知识分子	
——兼评国外毛泽东思想研究者观点	阎 颖 李发新(251)
苏俄、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对中国共产党建党的帮助	林宏达(257)
变与不变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对台政策之历史透视	袁大为(263)
1956 年《人民日报》改版及对“走转改”活动的启示	张 俊(270)
浅论中共五大党的建设	李佳玲(275)
做好党的群众工作 提升执政公信力	徐方平 金 飞(281)
马克思主义是怎样成为新思潮主流的	陈竹君(287)

❖ 社会主义道路探索

索科湖鹽鹼土主會并 ◆

1956—1966年：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 与社会的历史经验^①

王 智 武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1956—1966年的党、政府与社会^②的结构关系在苏联模式的框架下,产生冲突又不断调适。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通过意识形态、法理、制度等建构,将领导与执政权威放大,带来执政方式的全能化。社会主义改造展开后开始同构化的政党—政府—社会关系因此得到进一步强化。正是在这一持续同构化的过程中,社会焕发出持续的能量,新中国自过渡时期开始的工业化进程获得深入发展。同样也正是在这一同构化过程中,政党、政府与社会之间产生了一系列的冲突,导致社会发展出现波动。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又进一步运用国家权力来使冲突获得一定程度的调适,从而加深执政党的全能化倾向。因此,1956—1966年的十年间,中国党政社结构关联及其变迁与该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轨迹相一致,在冲突与调适中正误并存、扬抑交叉,但在总体上还是一个可控的相对稳定结构。

一、执政党的执政方式全能化

全能化^③是一个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执政党的一元化领导地位被进一步

① 丁俊萍教授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新形势下党的建设科学化研究”(09&ZD005)阶段成果。

② 目前运用“党—政府—社会”之框架来分析当代中国政治发展问题的专门研究尚不多见。主要散见于林尚立、陈明明、闫东、施雪华等的论著中。此外可参见拙作:《当代中国政治结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当代中国党—政府—社会的结构关联与变迁——历史线索、现实境遇与建构趋向》,《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党—政府—社会”三元结构:构建和谐社会的新视角》,《党政干部论坛》2007年第1期;《1978年以来中国政治结构的分野化:以“党—政府—社会”三元关系为中心》,《社会主义研究》2009年第6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与社会的历史与逻辑》,《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2年第2期。

③ 国内外一些学者多用全能主义或全权主义(totalism, totalitarianism)概念来概括与研究当代中国特定历史时期内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参见:Tang Tsou.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Post-Mao Reforms: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6. Benjamin I. Schwartz. *Communism and China: Ideology in Flux*. Cambridge, M. 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放大,导致党—政府—社会的结构关系发生倾斜;执政党的权能过度扩张,几乎无所不及,达到对政府—社会的深度与全面的统制。但笔者强调全能化的过程性,意指中国共产党在实施苏联模式的特定历史时期的运行轨迹,而非对执政党的本质性指称。这种轨迹并不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本质要求,而是根源于苏联模式及中国传统的特定历史现象;中国共产党一定时期内的全能化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但也有其快速实现社会动员和社会整合的积极效应,并非一无是处。跳出特定的历史时期,不管是极权主义还是温和的译名全能主义^①,抑或本文所称的全能化,都既不是中国共产党的制度性特征,也不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追求。但跳进特定的历史时期,全能化却又在以中国共产党为中心的党政社结构中打上了显著的烙印。

从 1956—1966 年这十年来看,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在致力于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另一方面受苏联模式以及一些非现代性因素(如封建性、乌托邦等)的影响,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维度产生全能化。这种全能化深刻地影响了执政党与政府、社会之间的结构关系。我们可以从意识形态与道德,路线、法理与制度,以及组织体系等多个方面来理解中国共产党的全能化。

(一) 意识形态与道德

这一时期的前段,以八大前后的认识为核心,执政党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系列成果,意识形态的主流是建设性的,偏差仅存于一定范围内。但进入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意识形态领域的过火斗争越来越频繁,以至于“以阶级斗争为纲”,为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作了铺垫。与意识形态领域的扬抑轨迹相一致,中国共产党的道德诉求机制也发生了变化。中国共产党道德自律中的人民性与利他性被过度泛化,导致产生了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的道德主义。1958 年 6 月 30 日,毛泽东在《人民日报》上阅读到关于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的报道,作七律《送瘟神》。其中有“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②的诗句。“尽舜尧”的比喻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毛泽东及中国共产党对广大民众的道德期许,这本身具有积极意义。但是,共产主义的崇高道德要求与当时中

^① 此看法的代表人物如萧功秦,不赞成将英文的 totalitarianism 译为“极权主义”,而是使用一个“更具中性的、偏重描述性”的“全能主义”的译法。参见萧功秦:《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政治态势与前景展望》,《战略与管理》1998 年第 5 期。

^② 毛泽东:《七律二首 送瘟神》,《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298 页。



国的发展程度之间毕竟具有相当的落差,需要生产力的长期积累来弥合。中国共产党在正常的意识形态宣传之外,试图运用公共权力的强制力对社会成员提出过高的道德要求,这会导致精神与物质之间的错位。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共产主义的道德要求,不断加强在社会层面的领导权威。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维度向思想层面进一步扩展,此谓执政党全能化的征候之一。

(二) 路线、法理与制度

1956—1966年,体现中国共产党地位坐标的路线、法理与制度规定,基本经历了1956年八大前后的良好开端到其后的反复、调整及至转向的过程。中共八大确定的一系列主张,即一般所称的八大路线,是1956—1966年社会发展的起点。八大路线中,中国共产党对社会矛盾作了基本准确的判断,顺利实现工作重心由变革生产关系向发展生产力的转移。基于此,中国共产党及时提出执政党建设的重大课题,试图从路线的高度通过制度性调整,来构造更为适应全面建设社会主义需要的政治结构,探求更为合理的领导与执政的方式,以及执政党与政府、执政党与社会的关系模式,但是,开局良好的八大路线却在不久后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冲击下发生转向乃至中断。在经历失误与挫折的警醒下,中国共产党对路线有所调整,包括1961年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但是,“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确立的带空想色彩、至善化的路线始终在影响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以至于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衍化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路线。执政党试图通过对国家与社会的高度控制,来迅捷实现自身的最高政治理想。在越来越误入歧途的路线引导下,中国共产党与政府、社会之间的关系不断出现冲突,全能化成为不可避免的选择。

在不断反复的路线主导下,法理与制度实际上处于缺失的状态。1954年宪法和1956年中国共产党八大的制度规定,拥有若干关于政治关系的积极原则,但受制于愈益“左”倾的路线、方针、政策,它们无法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线索。中国共产党不断超越既定的法理与制度,却又未能代之以适合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求所需的法理与制度体系,反而在路线法理制度的不断反复中愈益全能化。当然,全能化的中国共产党尽管未能在这十年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具体路径,但却无碍于取得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大成就。这正是特定条件下全能化的复杂历史意蕴。



（三）组织体系

经过新中国成立初期几年的组织建设，中国共产党已经全面构建起基于执政党的完整组织网络。这一组织网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与执政权威及地位的保障，也是党—政府—社会结构体系中的核心环节。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展开，中国共产党对自身的组织又有陆续的调整。一些措施是中国共产党加强领导与执政地位、提高执政能力的尝试，更多措施则带动执政党的全能化。理论上，中国共产党在这时也认识到应通过组织建设，寻求党政之间的合适边界。从中共八大及其前后的文献中可以找到关于防止以党代政的思考和探索。但是，总的组织发展趋势仍与执政党的全能化相呼应，主要表现为中国共产党组织的政府化，执政党在政府的专业管理机构之外，在党内成立对应的机构，直接管理行政事务。

毛泽东指出：“集中只能集中于党委、政治局、常委、书记处，只能有一个核心。”^①在这种思路下，中国共产党开始直接进入经济领域。1958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在中共中央成立政法、财经、科学、文教、外事小组。“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都是一元化，党政不分。”^②1960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在华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6个大区建立中共中央局^③，这也具有强化党的领导的作用。

此外，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毛泽东渐被神化，最高领袖的个人言论与思考在大多数情况下代替了党和政府的集体决策；相对应地，其他各级党政体系中，也大多出现中国共产党的“一把手”个人专断的现象。领袖或领导者个人全能化和执政党的全能化合而为一，成为一段时间内中国政治结构的一种独特现象。

二、苏联模式中党—政府—社会的同构化

中国党政社关系的同构化发生自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过程中。随

①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650页。

② 毛泽东：《对中央决定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各小组的通知稿的批语和修改》，《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68～269页。

③ 中央组织部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 第五卷：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1949.10—1966.5）》，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159页。



着苏联式社会主义模式的彻底建立,政党—政府—社会之间的同构关系也逐渐加深与固化。中国共产党以愈益全能化的执政方式,逐渐增加对中国政府—社会的进入程度。

在同构化的党政社结构关系中,党政关系是核心因素。刘少奇在中共八大的政治报告中从反对官僚主义谈及以执政党为核心的政治关系问题,集中反映中国共产党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开始之际对政治结构的一种积极思考,试图建立具有一定界限的党政社关系。此时的中共中央并不认为党政不分是一种必需的或良好的状态,但全能化执政党之意识形态,路线、法理与制度以及组织体系等方面的不断革命化,与该阶段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语境产生越来越大的冲突,使得中国党政社结构的演变轨迹在苏联模式的框架中走向更进一步的同构化。1956年后的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受战争年代革命党运行范式的历史惯性影响,另一方面又处于苏联模式的发展轨道之中,逐渐形成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全权领导党执政方式。1960年代,毛泽东提出:“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党要领导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军队和政府。”^①中国形成“党—政—军—法—经济—意识形态—文化”的统一整体^②,中国共产党是以领导者和执政者身份居于这一统一整体的核心。

与过渡时期的自主与多样相对,1956年以后的社会逐渐单一化。这种单一性并非中国境况的自发要求,而主要来自执政党的政治认识。中国共产党按照当时所理解的社会主义理念,有组织、有系统地推动中国社会走向单一化。在单一化的过程中,社会的边界愈益缩小,呈现一种结构性让退现象,党与政府的控制力逐渐加强。全能化的执政党或者直接、或者通过政府机构实现对社会的全面领导。尽管若干年中曾有过调整,但从总的趋势来看,社会更深度地同构于国家,主要表现为:经济领域持续单一的结构,并走向进一步的计划统配;思想文化领域被逐渐纳入政治与革命的语境中;社会组织的本来功能渐趋缺失,或被直接引入党政系列中,失去应有的相对独立性。

苏联模式同构化的宏观政治关系中,政党、政府与社会在形式上还是具有确定的界限,尽管这种界限在实践中很不清晰。人民公社制度则在一定程度上

^① 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32页。

^② [韩]咸灵台:《中国政党政府与市场》,经济日报出版社2002年版,第38页。



将形式上的党政社界限也打破了。人民公社党政社结构的极端合一化，建立在如下几个基础之上：其一，超越阶段的意识形态与道德取向。其二，“一大二公”的经济基础。其三，“工、农、商、学、兵”合一的社会结构。其四，政治、经济、文化合一的生活方式。

三、结构冲突与调适中的正误之辨

1956—1966年，中国共产党在大多数问题的探索上有一个不错的开端。认识到要“以苏为鉴”的执政党，试图对社会主义改造后期形成的同构化的党政社关系进行一定范围内的调整，使其能更加适应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要。但是囿于苏联模式，在1957年反右扩大化、“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1959年“反右倾”斗争以及后来的“四清”运动、中苏论战等一系列事件的影响下，党政社结构不仅没有得到改善，反而愈益向过度同构化的方向发展。尽管20世纪60年代初曾有过若干调整，却并未能根本阻止社会运行模式的日益僵化。

正如不能简单评判过渡时期党政社结构相对分立和同构化两种状态的价值一样，对于1956—1966年间苏联模式下中国共产党的全能化和因此带来的党政社进一步同构化之历史现象，也应置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下来判断其正误。

全能化与高度同构是一种非常冒险的状态。当执政党判断准确，不断出台好的决策时，则可以非常高效地推动国家与社会的快速发展；反之则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历史效果来看，“全能化一同构化”未尝不是中国共产党在匮乏时代的一个选择。这种结构容易出错，同样也易于纠偏。更何况，中国共产党还有长期革命党的经历，历史的惯性也影响了执政党执政方式的合理转换。

我们可以从很多方面来找寻这十年体制调适与结构冲突中正误之辨的历史因由，其中根本的还是应该归因于在历史的局限中中国共产党那一代人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水平。因此，中国共产党在那时就无法摆脱教条化的思维方式，无法超越苏联模式的桎梏，无法突破革命党的惯性，无法清除非现代性思想的影响。历史在酝酿着更严重的事件，也埋下了希望的种子。

全面建设时期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 关于党的纯洁性问题的思考

吴国斌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1956年党领导全国人民基本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开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带领人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不断提高执政党意识,高度重视执政党的纯洁性问题,形成了丰富的思考成果。全面建设时期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党的纯洁性方面提出了哪些问题?怎样思考这些问题?这些思考成果具有怎样的现实价值?这些是我们探讨新形势下如何在应对各种考验和风险的过程中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需要认真研究的重要课题。

一、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思考党的纯洁性问题的主要内容

在全国执政后特别是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中国共产党人面临更为复杂的环境、考验和风险。其中考验主要表现在面临着权力的考验、复杂环境的考验和剥削阶级意识的考验三个方面。在这些考验面前,有些党员、干部没有正确认识和自身存在的一些严重问题,居功自傲,盲目自大,思想蜕化;缺乏学习新知识、新技术和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群众观念淡化,对群众感情淡漠,官僚主义严重;生活上、经济上享受特权,腐化堕落。这一切使得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这里提出的考验和危险是与保持党的纯洁性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果党不能始终保持纯洁性,就不能应对和经受这些考验,难以化解和战胜这些危险。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根据不断变化和发展的实际,从我国具体国情和党情出发,进行艰辛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全面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采取各种措施不断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从总体上保持和发展党的纯洁性。

(一) 加强理论武装,保持思想纯洁

中国共产党是非常重视理论指导的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



和建设的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先后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确立为自身的指导思想，取得了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社会主义建设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而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理论武装就跟进一步，这是党加强自身建设的一条重要经验。

思想是导向，是灵魂。1963年，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干部会议上作了《过好“五关”》的讲话，提出党的领导干部要过好“五关”，即思想关、政治关、社会关、亲属关、生活关，其中第一关就是思想关。可见思想纯洁的重要性。要保持思想纯洁，就必须对广大党员、干部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刘少奇要求认真地加强干部首先是高级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使他们善于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观察和解决实际生活中的问题，同时加强在广大的新党员中进行理论和实际统一的教育。通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教育来清除党员、干部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实现思想上的纯洁，增强抵制腐朽思想的能力。

信仰纯洁是共产党人最根本的纯洁。保持思想纯洁，最重要的就是保持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陈云指出中国共产党要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其重要条件之一，就是要保持党的成分的纯洁。他认为党的纯洁“主要的不是年幼龄轻、没有社会关系、单纯的纯洁，而是指在复杂动荡的环境中忠心为共产主义坚持奋斗的纯洁”^①。

（二）严把“选育管用”关口，保持组织纯洁

陈云在分析干部队伍建设问题时指出，我们的任务是不断纯洁干部队伍，纯洁党的组织。1956年召开党的八大时，全国共有党员1073万，到1965年底发展到1895万，党员人数增加了76.61%^②。各级党组织通过对党员、干部队伍严把入口、加强教育、严格管理、畅通出口，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1. 严把入口，严格党员标准

严把入口关是保持组织纯洁的第一步。新中国成立后刘少奇分析了部分人加入共产党的动机和现状：在有些人看来，现在加入共产党，不独不要担负什么艰险，而且可以获得个人的许多保障以及荣誉、地位等。这时，落后分子、

^① 《陈云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0～201页。

^②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736页。